

◎名家近况

# 梁晓声：文学是人生的底色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这几个月，小说《人世间》俨然成了梁晓声生活的“主题”。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收割”了老中青几代观众，把这部本已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和作家本人又一次推向了前台。他感激大家对作品的认可，也因纷至沓来的采访和活动而感到有点累。采访前，梁晓声有言在先：“《人世间》谈得很多了，就不再谈了，希望大家读一读我的新小说《中文桃李》。”

实际上，自2017年底《人世间》出版后，梁晓声一直保持着高产的写作状态，先后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202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和我的命》，一部是不久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桃李》，都聚焦于“80后”青年的成长，以年轻人视角写出了一代人的“青春之歌”。尤其是新作《中文桃李》，被梁晓声视为自己的倒数第二部长篇小说。他说：“写作跟面点师傅开面馆没多大区别，我还有一本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写完后，不管水平怎么样，梁记面点店就要开张了。我的缸里还有一团面，这团面不能浪费。”

## 写给中文系“80后”

2002年，梁晓声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与青年学子有了直接而频繁的接触。当时，他的学生正是“80后”一代。多年来，他关注着学生们离开校园后的人生际遇，想通过小说的方式，给自己的教学生涯留下一点记录，也作为一份礼物，送给曾经教过的学生。

《中文桃李》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世纪之交，李晓东考入本省文理大学中文系后发生的故事。他和同班男生一起听汪尔森教授的课，获得文学启蒙；办《文理》杂志风光一时，刊发的作品被《读者》转载；接触有点各色女生徐冉，初尝爱情的纠结与甜蜜；面临升学和就业的压力，探寻前路何方……在这所大学，以李晓东和徐冉为代表的青年学子，在经历同学间的矛盾、冲突与误解，经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考验后，收获了成长、友谊和爱情。他们带着中文教育的四年所得，步入了小说下半场。

《中文桃李》是一部写给中文系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文可是非常风光的一个专业，才子才女们都在中文系。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中

文系，那如何得了？”梁晓声说：“后来文学开始边缘化了，当书中的主人公们开始学中文时，中文系好像成了一个‘筐’——过去是喜欢中文才去读，现在可能是权宜之计，出于理科成绩不理想才无奈去读。”但在在他看来，学生在中文系收获的人文教育，尽管不会令他们短时间内获得财富和成功，却培养了他们的从业能力、读书能力。比如小说中的李晓东，因担任《文理》主编，在日后省电视台、出版社、广告公司、房地产公司、纪录片团队几份工作中，每每能做出不错的成绩，以至于多年后妻子徐冉对儿子说，“你爸的人生，现在仍靠文学那碗饭垫底儿。”

和《人世间》相比，《中文桃李》给人的感觉没有那么多忧患与沉重。书中不乏一些“小幽默”和贴近年轻一代的网络语，如“撞（chōu，指顶撞）”“佛系”“颜值”等。“写年轻一代对我是个挑战，首先是语言不一样，尤其是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因此我在语言上尽量融入年轻人。”梁晓声说，“代沟肯定是有。到年轻人中去，和他们天天打成一片，代沟还在。你在沟那边，我在沟这边，我们还是可以亲密地交流。”

如果说同人写同人有自己的优势，那么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梁晓声写“80后”，则多了一些“审美距离”。“‘70末’‘80后’作家写同人写就不像，我觉得这有点标签化。我接触的学生不是这样。我更喜欢自己笔下这些‘80后’，他们也开玩笑，也幽默，但没有顽主的感觉。”

## 过一种“报告文学式”人生

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永远是困扰年轻人的问题。《中文桃李》中，女主人公徐冉问李晓东：“生活也可以分为歌类的、诗类的、小说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史诗类的，你憧憬哪一类生活？”两人商量一番，觉得没谁的生活可以始终如歌、史诗类的离普通人又太远，诗类的太理想主义、太脱离现实，小说类太难把控、太复杂，而散文类的更适合老年人，还是报告文学类更恰当——人生像一场自己给自己的报告，由不得虚构、自欺欺人，而又得有点文学性，加进小说、散文、诗歌的味道。

这种以文学门类来比喻生活的做法，是梁晓声的创新。他说：“这是过来人的看法。我没经历过诗一样的人生，压根就没敢那么想过。从少年时期我就觉得，这辈子得像报告文学一样写实，来不得半点的浪漫、抽象、虚伪——因为家里困难。”

小说下半场，两位主人公毕业进入社会后，也确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心中保有着对对方的“责任意识”，认真地生活打拼着。他们住过简陋的平房、昏暗的地下室，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与形形色色的人物遭遇，最终过上了如意的生活。而李晓东和徐冉也终于取得家长的认可，成

就了一段美满的婚姻。纵观这两个人物走过的道路，确实代表着很多“80后”青年的心路历程。他们纠结过，是留在家乡陪伴父母，还是远走他乡到大城市闯一闯；他们面临户口、房租、工资等生存压力，却不甘心做有违本性的工作；他们不愿“啃老”，以占朋友的便宜为耻；面对不可回避的代际冲突，他们逃避过、争吵过，最终理解了父母、收获了亲情。《中文桃李》堪称是“80后”青年一代的心灵史，作家以严肃的态度，写出了这代人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对情感的态度。

在梁晓声看来，小说家眼里不能只有小说，小说应该回应各种社会问题。他把作家定义为时代的记录员，认为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如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既是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他们都关心他人的命运。

《中文桃李》触及的一个社会热点话题是：年轻人是否要留在北上广深。作家把李晓东、徐冉这类“北漂”青年形容为“吊兰”，借主人公之口把北京分为了平时“动车式”的北京和过年时“绿皮车式”的北京。李晓东觉得，前面一种“北漂”的北京更可爱，但他最终选择回到故乡，加入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纪录片拍摄团队。“小说中设置灵泉、省城和北京三个层次，并不想给出主人公留在哪里是对、哪里是错的结论。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抉择是一种利弊、一种权衡，而无关对错。”梁晓声说。

《中文桃李》延续了梁晓声以往作品对“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一过”的思考，只不过他观察的对象从《人世间》里的“50后”变为了“80后”。但他的答案没有变——“70多年的人生走过，人一生到底该追求什么？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过眼烟云。”

## 大学需要人文气息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中文桃李》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也是一本大学教育之书。书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中文系教授汪尔森。他的课妙趣横生，让本想跨专业到对外汉语的学生也被深深吸引；他鼓励学生办刊物，推荐优秀作品发表；他和学生交朋友，让大家毕业多年后还每每怀念……更重要的是，他是学生们名副其实的“精神导师”，引导学生思考人性和人生的意义。

《卖火柴的小女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什么意义？汪老师说，读过它，同情的种子会在心里发芽。之后再读《快乐王子》《苔丝》《悲惨世界》，那么，他成为警长的话，也许就不会是沙威；她成女议员的话，也许会特别重视慈善工作，使卖火柴的卖花的无家可归的男孩女孩受到关爱而不再被冻死。

何谓“深刻”？汪老师说，它好比是瑞士名表里的钻石，“钻石就是发人深省的情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梁晓声 郭红松绘

的细节，过目不忘的文字或对话……深刻并不等于危言耸听，也不等于哗众取宠之论，更不等于对人性丑恶险恶的一味展览。”

常言道“文学是人学”，那么“人”是什么？汪老师说，人是欲望的宿主，也是理性之摇篮；人是文化的盛器，也是社会关系之和；人有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人的好奇心催生科学，人的娱乐渴求催生文艺……

其实，汪尔森正是梁晓声的自画像，书中汪老师讲的内容就是学生们挤爆教室也要听的梁氏文学课。“中文系教师只讲如何读懂一篇小说，还远远不够。应该更多地从作品出发，引发学生思考人生。比如我跟学生讨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看的，《安徒生童话》中的《海的女儿》和《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有怎样的异曲同工、罗丹的雕塑《人马》给我们理解人性以何启示？这些思想性的话题及其延伸的讨论才是最具有价值的。”梁晓声说：“我不认为讲课一定要像脱口秀一样热一下场，似乎不这样就不行，一堂课只有45分钟，学生是交了学费的。”

他还发现，课堂上的男生比较内向，不愿意发言，导致听到的讨论之声都出自同一性别。“这对讨论本身是一种遗憾。我们常说，要有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其中就包括性别——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看，这个碰撞是很有意义的。”梁晓声说。

上过梁晓声课的学生都知道，尽管课上讨论的问题严肃，但气氛却是放松和活跃的。他曾带学生看电影《出租车司机》，出资让学生买来饮料、面包、糖果，让大家边吃边聊在桌子上，怎么舒服怎么来，只有老师一个人拿着粉笔在讲台上。“我觉得文学课其实这样讲才对路。”梁晓声说。

在小说中，梁晓声借汪先生之口说出了他对大学人文精神的坚守：“文学专业是一个什么专业呢？首先是一个了解人性进而了解自己的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其实是大学之魂。没有点儿人文气氛的大学，不可能是一所好大学……”

他强调人文气息，其实是一种信念，相信“文学确曾起到过这么一点儿促使社会进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一点儿一点儿地，一百年一百年地影响着世道人心”。也正是在这重意义上，文学是人生的一种底色。

方向与尺度。评论家傅逸尘认为，这种“个人化”想象，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私人化”叙事，强调的是以往英雄与传奇话语的背面，即更多地还原和展现“历史化”大叙事下个体生命的生活与命运。《大西迁》在“个人化”想象与“历史化”叙事中找到了平衡点，打开了当前军旅文学作品主题叙事的某种可能。小说着力塑造了张连科这样有血有肉、富有爱国热情且极具灵魂深刻性的人物，一方面体现在正面叙写这个关键人物作为抗战英雄的英勇与顽强——不论是作为拆迁钢铁设备前赴后继，还是为“钢迁会”日常工作日理万机；同时，在涉及张连科家庭的这条叙事线中，作家同样倾注了大量笔墨。小说对张连科与家庭短暂重逢后又分别的场景刻画细致，借以展现张连科在“家”与“国”之间选择的纠结与矛盾，与他之后为“国”而义无反顾的使命感形成对比，显露出张连科情感的丰富性，使其人格更加立体。

《大西迁》以别具一格的方式补足历史记忆与表达空间，情感饱满而真诚地再现了以张连科为代表的一群抗战中默默奉献的普通人，彰显了即使根在破岩，仍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以顽强姿态等待来日昭华的精神信念。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 《一个女孩朝前走》讲述『时代楷模』黄文秀成长故事

本报记者 张鹏禹

一个生在贫困山区、贫困家庭的平凡女孩是怎样成长为“时代楷模”的？青年人的个人梦想和家国梦想如何结合？什么样的家庭教育能培养出好孩子？这些问题都能在《一个女孩朝前走》中找到答案。

该书聚焦“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文秀的年少时光，用纪实笔法记录下一个自强不息的壮族女孩在父母亲人、社会邻里关爱下，在时代阳光照耀下的真实成长经历。

2019年6月，黄文秀同志因公殉职，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与儿童文学作家阮梅随即启动了图书策划、采写和编辑出版工作。经过两年精心打磨，《一个女孩朝前走》于2021年7月出版，并入选“2021中国好书”、中宣部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等。近日，由《文艺报》社、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该书作品研讨会举行。

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看来，大部分读者对“时代楷模”黄文秀已有了解，然而新闻报道之外的黄文秀依然是我们陌生的。在《一个女孩朝前走》中，我们能看到黄文秀的儿童时代，她的哥哥姐姐，她的父亲母亲。“我尤其喜欢这部作品的开头，像童话的开头，写大山里有一个叫德爱村的村子，村里有一个叫柳上屯的屯子，屯里有一户人家，爸爸叫黄志杰，妈妈叫黄彩勤，以及谁和他们住在一起。我觉得这种童话般的写法文学性很强，成人读者、儿童读者都能被吸引住。”何向阳说。

《一个女孩朝前走》用丰富的细节和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邻家女孩的成长之路。书中写黄文秀对未来的坚定，她在高中毕业前在自我鉴定栏认真地写道：“我无法成为一只人人喜欢的‘橘子’，但我一直努力做一只优秀的‘橘子’。”写她对父母的深情，远赴北京求学前夕“来到爸妈房间，将煮好的一碗甜鸡

蛋递给妈妈，和爸爸聊到好晚好晚”。黄文秀驻点的百坭村，11个屯星散在大山中，有的甚至间隔十几里山路。书中写她驻村满一年时，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里，黄文秀发朋友圈说：“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与会专家认为，作者用客观的描写和丰富的感情，还原了黄文秀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描绘了新时代平凡英雄的成长经历和真实模样，以儿童能够接受的形式，将严肃话题与文学性、艺术性完美结合，呈现出当下主题出版精品图书应有的面貌和质地。

作者阮梅谈及创作体会时表示，还原楷模的成长之路是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作为儿童纪实文学作品，在采访时的用心用情比后期的构思和写作更重要。她希望本书能帮助它的小读者形成阳光、自信、包容、坚强、乐观、感恩的品德，成为父母放心的孩子，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时代需要的人。

## 叶梅散文集《福道》：与自然对话的心灵之书

本报电（文一）由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文艺家》杂志社、重庆出版集团主办的“以真诚之心，体察自然万物——叶梅生态散文集《福道》研讨会”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在北京、重庆举行。来自文学界、出版界的30多位专家学者就《福道》以及当前生态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展开了研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表示，生态文学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担负着重要使命，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态环保。作家叶梅经过深入采访、观察和体验，

近年创作出生态散文集《福道》，受到社会关注和好评。叶梅行走在祖国的山野原野、河滨湖畔，将情感、感悟、知性融入在这些生态散文之中，传递着生态审美体验，带给读者关于自然、生物与人类关系的多方位观照和思考。

专家们在研讨中表示，《福道》通过呈现生物多样性之美，强调唯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会有乡村和城市的天朗气清，人类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福道”，获得真正快乐幸福的美好生活。



◎新作评介

## 根在破岩 来日昭华

——评何鸿《大西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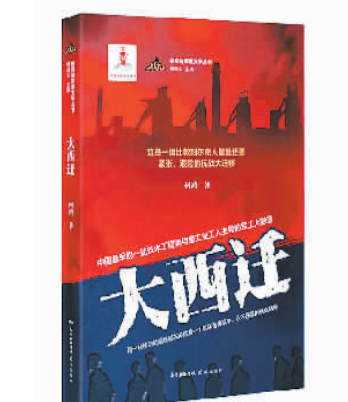
张凡 叶煜瞳

何鸿的长篇小说《大西迁》，是一部聚焦“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呕心之作。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年代，以张连科为代表的“钢迁会”成员，将庞大的重工业设备拆装，从上海辗转南京、武汉、长沙、宜昌，最后落户山城重庆的故事。在一程接一程的生死传递中，他们将昔日钢铁工业的根基屹立在破岩之中，纵使千磨万击也不惧，默默静待昭华来。

作为“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中的一本，《大西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旅文学，而更接近一部立于时代高度、以全新视角回望与审视抗战历史的长篇小说。在选题和叙事手法上，作家何鸿别具匠心——以抗战初期上海某大型冶金军工企业西迁的艰难历程反映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同时让埋藏于历史表层下的沧桑以小说这种体式“浮出历史的地表”。

从叙事上看，《大西迁》的双线交叉式结构是其最大特征，借此“还

原”了人们对“钢迁会”历史的认知与想象。一条叙事线以张连科为主，讲述了他在上海抗战爆发之际与“钢迁会”成员共进退、共抗争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沪上紧张战事下争分夺秒的钢铁设备拆迁过程，其次是“钢迁会”于武汉汉阳从最初成立到紧锣密鼓运作的经过，之后是迫在眉睫的局势下，克服重重困难艰难转运钢铁设备的过程。当时，身为上海炼钢厂厂长的张连科不啻生命危险，坚守在抗战前沿，一边听从上级安排组织生产，为前线生产并输送军工资资，一边心系钢铁工业的根基，准备拆迁、转移钢厂设施。从上海到武汉，再到宜昌，为了心中“钢铁强国”的信念，以张连科为代表的“钢迁会”为民族钢铁产业的未来留下了希望的火种。另一条叙事线，以张辅枢为主。作家从孩童视角出发，侧面展开对抗日战争的刻画。张辅枢从小懂事、敢于担当，与父亲张连科



同样富有炽热的爱国之情。在大迁移的队伍中，他一方面悉心照顾家人，与母亲分担家事，一路辗转最终在重庆与父亲张连科重逢；另一方面，处于恐慌与流离失所中的他，在经历战争痛苦后更坚定了心中的报国之心。小说的这两条叙事线并非平行发展，而是通过张连科、张辅枢这对父子之间的几次相逢交织起来，共同推进了故事发展，让这段跌宕起伏的抗战史更加立体丰富。

《大西迁》的另一特点是，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凸显个体精神的伟大，通过细节呈现来补全对历史的整体性认知，更加符合当代读者对主旋律作品的审美。作家何鸿在确保作品真实性的前提下，将“个人化”想象充分融入“历史化”叙事中，探寻叙事的